



贺淑芳《蜕》创伤记忆与动物意象书写研究

**A Study of Trauma Memory and Animal Imagery Writing in Ho Sok
Fong's *Tui***

杨岢恩

YONG KE EN

21ALB05100

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25



贺淑芳《蜕》创伤记忆与动物意象书写研究

**A Study of Trauma Memory and Animal Imagery Writing in Ho Sok
Fong's *Tui***

杨岢蕙

YONG KE EN

21ALB05100

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25**

Copyright Statement

© 2025 Yong Ke En.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2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5
第三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8
第四节 研究范围.....	9
第五节 研究方法.....	10
第六节 初步研究成果.....	12
第二章 创伤记忆书写.....	13
第一节 肉体创伤：历史记忆的载体.....	13
第二节 心理创伤：挥之不去的阴影.....	19
（一）梦境.....	19
（二）沉默.....	22
第三章 动物意象书写.....	26
第一节 蛇：创伤与记忆.....	26

第二节 蜘蛛：纠缠与蜕变.....	31
第四章 结语.....	35
第五章 引用书目.....	37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杨岢蕊 YONG KE EN

学号：21ALB05100

日期：2025 年 9 月 12 日

摘要

本研究围绕马来西亚小说家贺淑芳的长篇小说《蜕》展开，重点分析其创伤记忆书写与动物意象表现。研究指出，《蜕》不仅再现“五一三”历史事件的宏观背景，更通过叶金英、叶阿清、陈桂英等生活经历的细腻叙述，呈现官方档案与新闻报道中往往缺失的历史细节，使读者得以深切感知历史创伤对个体生活的深远影响。《蜕》一方面通过对肉体与心理创伤的细致描写，展现历史事件对人的具体影响；另一方面则借助蛇、蜘蛛等动物意象的象征运用，将抽象的记忆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文学形象。这些意象既喻示恐惧与束缚，也隐喻蜕变与重生的可能，从而将个人经历与历史事件紧密交织。通过记忆书写，不仅重构历史现场，更使被湮没的个体经验得以彰显，进而展开对人性与社会记忆的深刻反思。研究表明，《蜕》的记忆书写为理解“五一三”事件那些被遮蔽的历史与个体经历提供重要路径，凸显文学在历史再现与社会认知中的价值。

【关键词】 贺淑芳；《蜕》；“五一三”事件；创伤记忆书写；动物意象书写

致谢

时光荏苒，转眼间四年的大学生活已悄然步入尾声。在这段充满挑战与成长的旅程中，本论文从萌芽到最终完成，得益于许多人的支持与帮助，谨在此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我要深深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你们多年来无私的付出与始终如一的信任，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与生活保障，使我能够安心求学。每当我遇到困难与迷茫，你们总是第一时间给予我鼓励与支持，是我不断前行的力量源泉。

其次，衷心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李树枝老师。从论文选题、研究方法到撰写修改的每一个环节，老师都以极大的耐心和专业的眼光给予我细致而宝贵的指导。您深厚的学术素养，以及始终如一的鼓励，不仅帮助我顺利完成本论文，更让我深刻体会到学术的意义与价值。

再来，感谢我身边的朋友们，特别是佩霖、诗琳和雨轩。在论文筹备和写作期间，你们时常与我交流思路、分享经验，在遇到瓶颈时给予我精神上的支持。那些共同奋斗、互相打气的日子，将成为我大学生涯中最珍贵的记忆。从 Foundation 到 Degree 一路走来，能够与你们携手并肩，是我求学旅程中最幸运的事，这份真挚的情谊将永远珍藏于心。

回首这段论文写作历程，可谓曲折与收获并存。期间我曾遭遇电脑与平板被偷，重要资料一度丢失，写作进程被迫中断。但在家人和亲友的关怀与帮助

下，我重新整理思绪，一步步克服困难，最终顺利完成论文。这段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坚持与互助的意义，也让我学会在逆境中成长。

最后，愿借此机会，向所有在求学道路和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关心、支持与帮助的人们，致以最由衷的感谢。你们的陪伴让这段大学之旅充满温度，也让这段时光成为我生命中深刻而美好的一章。

第一章 绪论

贺淑芳（1970-），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双溪里茂（Sungai Limau, Kedah），是现代马华文学作家之一。本科毕业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物理应用系，后来毅然转向中文领域，赴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攻读中文所硕士，并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获得中文博士学位。她的职业生涯同样充实，曾在《南洋商报》担任专题作者、后来成为拉曼大学中文系讲师与台北国立艺术大学助理教授。2012年，贺淑芳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迷宫毯子》。两年后，她又推出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湖面如镜》。她的文学作品更是屡获殊荣，早在2002年，贺淑芳便凭借短篇小说〈别再提起〉（现收录于《迷宫毯子》）获得第二十五届时报文学奖小说评审奖；2008年，她的短篇小说〈夏天的旋风〉（现收录于《湖面如镜》）荣获第三十届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2015年，凭借〈初始与沙〉获得九歌年度小说奖。2023年，贺淑芳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蜕》。该作品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4年发布的短篇小说《繁花盛开的森林》，但其中“五一三”事件仅是小说背景的一个小小片段。随着创作的推进，贺淑芳决定将其拓展为长篇小说，选择以“五一三”事件前后的历史背景为《蜕》的时间轴心，借助底层华人女性的视角与情感，重新审视并揭示“五一三”事件的历史，填补这段历史中被忽视的空白。

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蜕》以“五一三”事件作为历史背景，所谓“五一三”事件，是指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种族暴乱。根据官方描述，这场暴乱源于反对党在第三届大选胜利后的挑衅行为，激化了马来群体的不满情绪，最终引发暴力冲突。¹官方将“五一三”事件定性为一场民间自发的暴乱²，通过压制异议和限制讨论，形成了一种单一化的官方叙述。这种叙述遮蔽了个体与集体的创伤记忆，使许多受害者的声音被压制在官方记录之外，形成对历史真相的失语。

贺淑芳《蜕》试图打破这种失语，在文学领域重构“五一三”的记忆书写。尽管她在后记中表明不希望作品被简单视为历史事件的再现或辅助材料³，但她通过个体记忆与集体历史的交织，为这一事件提供独特的文学视角。她从2017年便开始构思，起初计划采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通过一群经历过“五一三”幸存者或受难者家属的旅程书写创伤记忆。然而，随着创作的深入，她在过于贴近历史与保持文学距离之间不断挣扎，担忧如何平衡事件真实性与文学表现力。⁴于是，2018年成为这本小说的重要转折点，她参与傅向红教授主导的“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通过田野调查与访谈获得了更为鲜活且具体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以及受害者家属的口述经历，使她得以深入理解创伤的多重维度，并为创作注入历史与情感的真实张力。因此，创伤无疑是《蜕》的

¹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513解密文件》（八打灵：人民之声出版，2007），页38。

² 柯嘉逊，《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513解密文件》，页1。

³ 贺淑芳，《蜕》（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23），页298。

⁴ 罗昕，〈对话 | 澎湃新闻专访贺淑芳：《蜕》书写了三代女性的生活与境遇〉，《澎湃新闻》，2024年11月23日，检索于2024年11月25日。<https://web.shobserver.com/sgn/detail?id=1466450>。

核心主题之一，它贯穿于小说中每个人物的肉体、心理和记忆，揭示创伤的多重面貌。贺淑芳通过非线性的叙事结构，以三代华人女性的视角，展现“五一三”事件所造成创伤如何深植于个体的肉体和心理之中。

贺淑芳通过对肉体创伤的细腻刻画，直观地向读者呈现“五一三”事件中暴力行为对身体的摧残。无论是遭受强暴、被殴打致使手指扭曲，还是身上永不消退的疤痕，小说都以细致的描写揭示“五一三”对肉体的直接侵害。这些创伤以疤痕、疾病或其他身体症状的形式永远存在，成为暴力的遗产，也是个体无法摆脱的历史烙印。与此同时，小说中频繁出现令人震撼的画面：一家人在烈火中被焚烧致死，尸体死不瞑目；矿湖上漂浮的腐烂尸体，无声诉说着自己惨烈的死亡；甚至有人物突然消失于“烟花”中的情节。这些细节使读者在强烈的视觉冲击下，感受到个体的惨痛遭遇，也促使其深刻思考创伤如何深深嵌入个人与集体的记忆中，成为历史无法抹去的一部分。

在心理层面，创伤多以压抑、梦境、沉默等形式显现。叶阿清经历了几乎全家的惨死，又因好友友梅的死而深感自责，她说：“**死亡就在我里面，像颗种子。**”⁵这句话以隐喻的形式指出，创伤如种子般扎根在人们心中，随时可能发芽。这种心理创伤不仅停留个人的心灵深处，还弥散到整个家族，甚至渗透到下一代。如金英的女儿陈桂英，也承受家族破碎与爱人阿班离去的双重打击。在时代的变迁中，她在迷茫中挣扎生存，内心却始终无法摆脱悲痛的阴影。作为陈桂英的女儿，萝的成长过程中深受母亲与外婆创伤记忆的影响。她试图通过家族记忆拼凑历史，后来逐渐意识到创伤不仅属于亲历者，也深深影响着后代的记忆，正如萝所言：

⁵ 贺淑芳，《蛻》，页74。

“我们不断死去，在一座城市里，只要七八年，新生命就出来，一代人的记忆就模糊，二十年就更迭换掉许多符码……唯独爱恨愤怒就是肝脏，内里，几代人都一样。”⁶

这话表明即使事件已经过去很久，但伤口并未曾得到妥善的处理，创伤始终无法痊愈。

最后，《蜕》中的创伤叙事并非止于苦难的书写，而是通过女性的视角展现创伤后的重建过程，讲述她们在创伤后的挣扎与蜕变。这种蜕变并非简单的重生，而是对创伤记忆的重新审视与接受。正如《蜕》以蛇、蜘蛛等蜕壳动物为象征，隐喻蜕变是一个伴随痛苦的过程，既可能通向新生，也可能引向死亡。通过动物书写，将女性的创伤与成长融入自然界蜕变过程，探讨创伤与蜕变之间的关系，从而赋予小说丰富的象征意义。

⁶ 贺淑芳，《蜕》，页 237。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蛻》是贺淑芳于2023年8月15日出版的长篇小说，截至目前，关于该作品的学术研究仍然稀缺。笔者目前尚未找到专门探讨《蛻》的期刊文章或硕博学位论文。因此，笔者将通过查阅与作品相关的文献，如“五一三”事件、创伤理论、动物意象等，进一步分析《蛻》的记忆书写。

“五一三”事件是《蛻》的核心背景，但该事件至今仍是马来西亚社会的敏感议题，许多人选择避而不谈，且马来西亚国家档案中关于1969年的相关报道也完全缺失。因此，柯嘉逊《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513解密文件》对笔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论据。此书是一本被国安部承认的一本“五一三”书籍，揭示了长期被马来西亚政府封存的真实档案，还原“五一三”事件的真相。官方一直将暴力冲突归咎于反对党，宣称这些事件是自发产生的。⁷但柯嘉逊的著作则明确指出，“五一三”事件并非偶然爆发，而是精心策划的，目的是通过暴乱推翻在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1903-1990）的政权⁸，并通过多项证据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重构。此外，《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一书让笔者更深入体会不同视角下关于“五一三”的个人经历。通过真实的个人口述，书中让读者重回那暴力现场，无论是火烧事件还是到处都是无头尸的街道，都揭示当时事件对马来西亚华人在心理以及肉体上的创伤⁹，种种内容为笔者研究《蛻》中创伤记忆书写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当然，笔者也查阅了几篇关于“五一三”事件的硕博学位论文，以进一步拓展对该

⁷ 柯嘉逊，《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513解密文件》，页1。

⁸ 柯嘉逊，《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513解密文件》，页3。

⁹ 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八打灵：文运企业，2020），页8-11。

事件的理解。如林媛婷的《五一三事件对华人之集体记忆探讨》收集和分析经历“五一三”事件的华人群体的集体记忆，填补了马来西亚有关该事件的记忆空白。¹⁰

在本研究中，笔者将重点探讨《蜕》中的创伤记忆书写与动物意象。创伤记忆书写则将被分为心理创伤与肉体创伤两大部分。针对创伤记忆书写的部分，以车博文所著的《弗洛伊德文集第二册〈释梦〉》为参考，讨论了人在清醒时被压抑的欲望、焦虑或冲动，在睡眠中通过梦的形式得以表达。¹¹此外，笔者还参考了赵雪梅的《文学创伤理论评述——历史、现状与反思》，从中了解到战争、大屠杀、性侵等经历常导致的精神疾病——“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 PTSD），其特征包括记忆闪回、噩梦等反复性特征。¹²此外，也参考了贺江的《创伤理论与创伤文学》以及冯少敏的《创伤理论视角下的“创伤写作”研究》，这两位学者皆分析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创伤（Trauma）理论，指出弗洛伊德认为创伤的发生不仅仅是外部事件的直接结果，更是因为个体心理防御机制的失效。¹³当强烈的惊吓或创伤性刺激突破这些防线时，创伤便会产生。然而创伤的后果并非简单的情感反应，而是一种“强迫性重复”（Repetition Compulsion）的现象¹⁴，意味着创伤事件在心理上不断回响，并强制性地再现，导致个体反复经历痛苦的情绪体验。这种重复性不仅没有带来情感的解脱，反而加剧了内心的冲

¹⁰ 林媛婷，《五一三事件对华人之集体记忆探讨》（南投：国立台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硕士论文，2007），页 1。

¹¹ 车博文，《弗洛伊德文集第 2 册〈释梦〉》（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 年），页 121。

¹² 赵雪梅，〈文学创伤理论评述——历史、现状与反思〉，《文艺理论研究》，2019 年第 1 期，页 203。

¹³ 贺江，〈创伤理论与创伤文学〉，《百色学院学报》，2014 年第 6 期，页 133。

¹⁴ 冯少敏，《创伤理论视角下的“创伤写作”研究》（黑龙江：哈尔滨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页 13。

突与不安。笔者认为，上述文献对《蛻》的创伤记忆书写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主人公们的噩梦或自责的情绪反复出现，正体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症状。无论是在梦中还是清醒时，他们的内心都难以平复创伤带来的心理冲击。这种持续的内心冲突正是弗洛伊德所称的强迫性重复，即创伤在不自觉中反复回响，无法得到情感的解脱，甚至使个体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

至于动物意象的书写，《蛻》中的每个小节都以五种具有蛻皮特征的动物——虱子、青蛇、蝴蝶、螃蟹和蜘蛛构成。但其中，青蛇与蜘蛛出现在文本的次数较多，而且在文学和心理上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形成与文本内容紧密相连的深刻隐喻。笔者在现有研究中尚未找到专门探讨《蛻》意象的期刊文章或硕博学位论文，因此，便转向了与这些动物相关的文献。如李艳、李红岩的《〈搜神记中〉蛇意象书写研究》的研究发现，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教盛行，佛教相关故事融入志怪传统，对中国神话与志怪文学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佛教龙王信仰冲击，蛇的形象由吉祥象征逐渐分化为兼具智慧与灾厄的双重内涵。¹⁵武小钰、吕汝泉，《中国古典诗歌与日本俳句中“蜘蛛”意象的差异》则讨论了蜘蛛意象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一方面常被描绘为精于设网、暗藏杀机，象征阴险与算计¹⁶；另一方面又因“喜子”、“喜蛛”的谐音，被视为吉祥的预兆，尤其在七夕节俗中象征灵巧与好运。¹⁷为此，笔者得以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些动物意象的象征意义，并对《蛻》中的动物意象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¹⁵ 李艳，李红岩，〈《搜神记中》蛇意象书写研究〉，《长江小说鉴赏》2025年第1期，页38。

¹⁶ 武小钰，吕汝泉，〈中国古典诗歌与日本俳句中“蜘蛛”意象的差异〉，《文学教育》2019年第4期，页10。

¹⁷ 武小钰，吕汝泉，〈中国古典诗歌与日本俳句中“蜘蛛”意象的差异〉，页11。

第三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贺淑芳《蜕》以马来西亚“五一三”事件为背景，通过创伤书写和动物意象，为这一历史的伤痛提供全新的文学诠释。笔者选择以《蜕》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因为这是一部较新的作品，还因为其大胆地触及马来西亚历史中极为敏感且常被回避的话题——“五一三”事件。这一事件长期以来被简化为种族冲突，但小说通过对个体和集体创伤的呈现，揭露其对人们心理和肉体的深刻影响。笔者深感好奇：为何他人选择避而不谈，而贺淑芳却勇敢书写？因此选择贺淑芳《蜕》作为研究对象，题目将拟定为——贺淑芳《蜕》创伤记忆与动物意象书写研究，本研究旨在围绕小说的记忆书写展开深入探讨，具体研究目的如下：

其一，贺淑芳通过《蜕》试图传递的核心主题是什么？她如何超越单纯的历史叙述，探讨创伤与人性？其二，小说如何通过文学手法呈现创伤？其三，贺淑芳如何通过记忆书写重构“五一三”事件？其四，动物在创伤表达与象征意义上发挥了什么作用？

通过以上问题的分析，笔者希望揭示《蜕》对“五一三”事件创伤书写的独特诠释，并为该主题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考视角。

第四节 研究范围

本研究的范围主要聚焦于贺淑芳的小说《蜕》，具体探讨其创伤书写与动物意象的运用，分析这些文学手法如何呈现马来西亚“五一三”事件的历史创伤及其对个体与集体的深远影响。

研究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创伤记忆书写和动物意象书写。在创伤记忆书写部分，进一步细分为肉体创伤和心理创伤两个小节，分析贺淑芳如何在小说中再现“五一三”事件的创伤记忆。在肉体创伤部分，将关注如何通过身体描写，使暴力的伤痕不仅停留于肉体，更被铭刻为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体现创伤记忆的肉体化存留；在心理创伤部分，将分析人物的梦境与内心独白，揭示记忆如何以反复出现的方式侵扰个体，说明创伤记忆在认知、情感与行为反应中持续发挥影响。

在第二部分中，动物意象书写将聚焦青蛇与蜘蛛两种意象。之所以选择这两种动物，除了它们均为蜕皮动物外，还因为它们在文本中出现频率较高，并在《蜕》中承担重要象征功能。本研究将分析青蛇与蜘蛛如何象征人物在创伤后的心理蜕变与自我重建。具体而言，青蛇在突发事件与梦境中既象征创伤的自体，又体现潜意识的自我修复；蜘蛛则通过在阴影中织网及缓慢脱皮的描写，呈现创伤的缠绕及心理重建的渐进过程。通过对这两种动物意象的深入分析，本研究旨在揭示它们如何与创伤书写相辅相成，反映人物内心的挣扎、蜕变与成长。

第五节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文本细读法、社会历史批评法、文献研究法和理论分析法这四种方法，深入探讨贺淑芳《蜕》的记忆书写。

首先，文本细读法是本研究的核心方法。所谓“细读法”，是指小说中的语言、修辞、结构尽可能作出详细的分析¹⁸，特别是在创伤和动物书写方面的具体表现。这种方法将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帮助笔者挖掘文本的深层意涵，理解作者想带给读者的信息，发现其文学价值。

其次，社会历史批判法为本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背景分析。由于每一部作品的诞生都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因此，要全面理解一部作品，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结合其人物所处时代的背景来进行分析。¹⁹以贺淑芳《蜕》为例，小说以马来西亚“五一三”事件为背景，深刻反映这一历史事件对个体与集体的创伤影响。因此，研究将结合相关的历史资料，如柯嘉逊《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 513 解密文件》、《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等文献，考察“五一三”事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记忆，进一步分析这些背景如何融入小说的创伤书写中。通过这种方法，笔者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作者对历史创伤的文学呈现。

此外，文献研究法将用于收集与《蜕》创伤书写和动物意象相关的研究资料，尤其是涉及创伤理论、记忆研究和动物意向等文献。通过搜寻中国知网

¹⁸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185。

¹⁹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第二版）》，页72。

(CNKI)、华艺线上图书馆 (Airiti Library) 以及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 笔者将梳理出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理论框架, 为本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支撑。同时,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蜕》, 笔者还收集了各类媒体对贺淑芳的访谈资料, 如星洲日报、联合早报、澎湃新闻等访谈新闻, 企图从中了解作者本人对《蜕》的理解。

最后, 理论分析法主要用于在创伤书写的部分。笔者主要使用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弗洛伊德相关的创伤理论如强迫性重复, 来对小说中创伤书写进行深入解读。这种方法将帮助笔者从理论层面揭示文本中的深层内涵, 并探讨贺淑芳如何通过文学形式对历史创伤与女性命运进行思考。

第六节 初步研究成果

本研究以马来西亚作家贺淑芳的长篇小说《蜕》为主要研究对象，围绕创伤记忆书写与动物意象书写两大核心议题展开分析。目前已完成相关文献综述与文本细读，初步取得以下成果：

首先，在创伤记忆的探讨方面，研究发现《蜕》通过对“五一三事件”的叙事再现，呈现暴力历史所遗留下的深层心理创伤。具体而言，小说通过对身体创伤的描写，揭示肉体上的暴力如何成为历史记忆的直接载体；而在心理层面，人物的梦境、内心独白与潜意识描写则折射出创伤记忆的持续与难以消解。这种双重表现方式强化了历史创伤在个体与集体层面的长久影响。

其次，在动物意象的分析上，研究初步认为蛇与蜘蛛是文本中最具代表性的隐喻性意象。蛇意象与死亡、恐惧和创伤记忆紧密相连，象征历史中被压抑与遮蔽的痛苦经验；蜘蛛意象则通过蜘蛛网与蜕皮的隐喻，展现创伤的纠缠与个体在痛苦中不断寻求重生的可能。这些动物意象不仅丰富文本的象征层次，也为读者理解创伤的再现与超越提供新的视角。综上所述，小说中的创伤记忆与动物意象书写共同批判官方掩盖“五一三”真相的行为，这种行为忽视众多受害者的痛苦，使创伤的影响变得更加深远，成为人们心中那难以愈合的伤口。

第二章 创伤记忆书写

在《蛻》中，创伤并非单一面向。对部分角色而言，暴力是直接施加于身体；而对另一部分角色，则是通过目击暴力、感知死亡而造成的心理冲击。无论形式如何，创伤的生成往往经由肉体或感官知觉展开，身体因此成为第一道受创的媒介，承载暴行留下的痛楚与记忆痕迹。《蛻》频繁出现的肢体残缺、面容毁损、鲜血喷溅等场景，不仅凸显暴行的残酷，也使创伤得以在记忆中定形，延伸出反复回忆、恐惧发作、梦魇等长期心理阴影。然而，这些书写揭示，《蛻》中的创伤记忆并不止于个体层面，更投射出“五一三”事件在集体记忆中留下深深的伤痕。换言之，小说所承载的记忆始终与社会历史记忆交织，使文本成为见证与再现“五一三”创伤记忆的重要场域。

第一节 肉体创伤：历史记忆的载体

“伤痕类型学”（a typology of scars）为理解肉体创伤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切入点，伤痕既是暴力施加于身体的见证，也是暴力在文本中的符号。它既表明身体曾经遭受的割裂与暴露，又意味着在时间的推移中被迫愈合。伤痕因此不仅是一种肉体证据，指向暴力的真实发生，更是一种记忆的触发器，使人们一方面渴望遗忘，一方面又被不断拉回暴力的现场。²⁰由此可见，身体上的创伤不只是生理层面的痛苦，更是记忆与叙事的符号化载体。

²⁰ 王德威，《一九四九：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08），页9。

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爆发大规模的种族冲突事件。据官方统计，截至同年5月28日，约有二百间房屋在暴乱中被焚毁。²¹然而，历史的残酷往往隐藏在宏观数据的背后。《蜕》开篇〈桂英与阿班〉正是将叙事聚焦于这“二百间”房屋中的一间，细致描摹陈桂英一家在其中的悲惨遭遇，将冰冷的统计数字还原为血肉模糊的个体创伤。当时年仅十七岁的桂英，已被迫面对死亡的冲击。在这场暴乱中，她的大舅（叶财发）、外婆（翁亚玉）、舅母以及两名年幼的外甥女等共七个家人均惨遭放火焚屋，葬身火海。大舅的遗体被发现时手脚支离破碎，仅凭手指上的婚戒才得以确认身份；外婆倒在屋中木扶手旁，身体焦黑缩小，疑似在浓烟中失去意识后丧生。其他亲人聚集在客厅，亦无一幸免。²²文本以冷静而细致的语调描绘肉体被“剁过烧过”、“**焦肉翻起露出骨骸**”、“**手指剥落，指环竟哐啷掉出来**”²³等细节，迫使读者去想象暴力发生的瞬间。这些血肉迷糊的遗体正是王德威所言“记忆触发器”的具象化，成为桂英心理创伤的初始裂痕，创伤如同缓慢渗入织物的血渍，在日常生活的缝隙间悄然蔓延，形成持久的心理阴影。

后文进一步写到，桂英的三舅（叶阿安）试图为大舅等亲人料理后事，却因警方阻挠，连遗体都无法收殓，最终被强行带走，家属不得安葬。²⁴根据“五一三”事件的口述史料，一名时年二十岁的巫裔青年被指派到某村庄的步行桥下收集遇难者遗体。清真寺寺主规定，若遗体为穆斯林，则予以打捞并安葬；若为华裔，则任其随水漂流，后续交由警方处理。而警方的处理方式，则是将所有打捞上来的华裔遇难者遗体统一送至医院，坚决拒绝归还给家属进行安

²¹ 柯嘉逊，《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513解密文件》，页59。

²² 贺淑芳，《蜕》，页24。

²³ 贺淑芳，《蜕》，页25。

²⁴ 贺淑芳，《蜕》，页25。

葬。²⁵更有幸存者回忆，他们在警局查询失踪亲属时，被要求从数本相簿中辨认尸体照片，一旦确认身份，警员便立刻收回相簿，阻止继续翻看，并明确拒绝提供任何遗体照片。直到六、七年后，官方才通知死者的埋葬地点在双溪毛糯麻风病院（Sungai Buloh Leprosy Settlement）。²⁶学者也因此批评道，当局只允许家属翻看相片确认身份，却不许携带相片，更不许领回遗体，剥夺了家属对死难者遗体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同时也阻断他们追查死亡原因。²⁷由此可见，作者并非在虚构情节冲突，而是基于残酷的历史事实进行书写。这使得小说的叙事超越了个人家庭的悲剧，成为对那段被遮蔽的历史的文学证词，并对事件背后所隐含的族群歧视提出尖锐的批判。

在〈桂英与阿班〉一文中提到，外婆家出事那天，没有看到排行第七的阿清姨和第八的阿玲姨。事实上，五一三当天，叶阿清下班后赶着去取回一双修补好的白色尖头鞋，原本打算独自前往，最要好的朋友友梅却坚持同行。两人一同进入市区，路过花摊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街道陷入混乱，她们就此失散。阿清仓皇逃命，跌入沟渠，再次醒来时已在医院。²⁸而友梅的遗体则在几天后由母亲认领——小说中如此描写友梅：“**头脸血污，半边脸磨烂，难以辨认。**”²⁹

阿清虽在此次动乱中侥幸生还，但其身体仍承受了爆炸所带来的实质性创伤。即便她在清醒后便得知家人于此次动乱中罹难，随后又确认最亲密的朋友友梅亦已身亡，作者却并未急于将她的幸存处境引向情绪性的铺陈，而是首先

²⁵ 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页 62。

²⁶ 思想空间，〈傅向红：幽魂飘往何处？马来西亚五一三的民间述说（二之二）〉。

²⁷ 思想空间，〈傅向红：幽魂飘往何处？马来西亚五一三的民间述说（二之二）〉。

²⁸ 贺淑芳，《蜕》，页 38-39。

²⁹ 贺淑芳，《蜕》，页 40。

透过一系列感官错乱的书写，将爆炸对身体的破坏具体而真实地呈现出来。文本中“阿清闭着眼睛，喉咙依旧热痛，黑色煤屑好像吐不完”³⁰的描写，延续爆炸对身体的持续性损伤。喉咙热痛，暗示高温气流或烟尘吸入所造成的黏膜灼伤，而黑色煤屑则指向爆炸后空气中悬浮的碳屑侵入呼吸系统后形成的物质性残留。根据吸入性损伤临床诊断标准，患者在封闭环境中遭遇爆炸，若出现口腔炭末残留、咽喉灼痛及吞咽困难等表现，即可确立吸入性损伤的诊断。³¹阿清在爆炸后跌入沟渠，这一狭窄空间进一步加重烟尘与炭屑在呼吸系统中的残留。作者藉由这些具生理指征性的细节，将爆炸事件对身体的内在侵蚀转化为可感知的创伤叙事，凸显暴力在人体内部留下的不可逆的肉体创伤。

这类延续至日常生活的创伤，在宋万波的经历中同样可见。暴动发生仅一个月后，警察便展开大规模搜捕，不仅针对共产党恐怖分子，连滋事分子、私会党成员、派发传单者，乃至形迹可疑的工人都难逃罗网。³²据史料记载，截止1969年7月，共有8114名触犯戒严令或造谣者被捕³³，而宋万波阴差阳错地被列入了这份名单，在长达九个月的羁押期间，他的食指与尾指遭暴力殴打至永久性扭曲变形，背部更布满鞭笞留下的狰狞疤痕。即便获释后，疼痛依旧反复袭来，使他不由自主地发抖。自此以后只要闻到辛辣气味，如泰式酸辣面，就会引发剧烈呛咳，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小便失禁。³⁴那双扭曲变形的手，永远剥夺了他曾经的谋生技能，再也不能灵活地装配电线或精准地敲打钉子。后来他只

³⁰ 贺淑芳，《蛻》，页40。

³¹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烧创伤分会、郭光华、朱峰、黄跃生、吴军、孙永华、夏照帆、付小兵，〈吸入性损伤临床诊疗全国专家共识(2018版)〉，《中华烧伤杂志》2018年第11期，页411。

³² 贺淑芳，《蛻》，页89。

³³ 柯嘉逊，《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513解密文件》，引自Financial Times 1969年，页71。

³⁴ 贺淑芳，《蛻》，页55。

能冒用他人执照开出租车，终日提心吊胆地计算着这份工作能维持到几时。³⁵无论是叶阿清还是宋万波，这些后遗症如同无形的枷锁，将那段黑暗记忆牢牢镌刻在他们的肉体与生活之中。媒体报道大多强调政治局势与社会安定，却少有幸存者身体受难的具体书写；而小说则恰恰通过这些细节，把暴力的真实感还原出来。

当然，《蜕》并不仅止于记录个体的苦难，还有对五一三事件中的暴力场景进行了大量直面而赤裸的书写，尤其通过对肉体遭受暴力摧残的直接呈现，展现五一三的残酷本质。这种暴力书写在〈土（未的故事）〉一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开头以戒严时期为背景，描绘了民众在严格军事管制下的生存状态，人们行色匆匆，有的赶着采购粮食，有的急于拨打电话，街头弥漫着不安的紧迫感。³⁶政府实施戒严的用意在于尽快遏止暴力事件的蔓延，各地仅在特定时段短暂解禁，其目的不过是让民众得以外出购买食物。待戒严重新生效后，若仍滞留街头，便可能随时面临军人开枪或强行拘捕的危险。³⁷

随后，叙事又回溯至五一三事件爆发的当天下午，小说通过未的视角再现了暴力升级的过程，场面也骤然转为紧张与混乱。街头传来“排华”的喊声，有人催促民众尽快回家，称马来人即将纵火烧屋，也有人呼吁奋起反抗。正如美国的《时代》杂志所报道的那样，事件爆发期间，马来人手持刀剑与匕首，

³⁵ 贺淑芳，《蜕》，页 63。

³⁶ 贺淑芳，《蜕》，页 176。

³⁷ 柯嘉逊，《1969 年大马种族暴乱 513 解密文件》，页 41。

闯入吉隆坡的华人聚居区，进行纵火、抢掠与杀戮。华人为了报复，在印度人的协助下以手枪和猎枪反击，并袭击马来人的村庄。³⁸

回到文本中，当未途经某巷口时，遇见曾在工作上帮过他的亚德，亚德背着一名二十多岁的重伤青年。文中对伤者的描写极具视觉冲击力：“**背后从肩膀有刀伤劈下来，斩到快绵烂**”。³⁹最终这名青年在他们的搀扶下停止了呼吸。就在他们试图将遗体转移时，枪声骤然响起，逃亡的民众像标靶一样被成批射杀，街道瞬间血流成河、化为屠场。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逃亡者遭射击的刻画，恰与口述史料中那些凡奔跑者皆立刻中枪的集体记忆相呼应。⁴⁰后来，未在进退维谷之际，又目睹更为骇人的一幕：对面商铺的华裔男子刚开门，便被守候的马来人“**一刀劈开头颅，血喷满地**”。⁴¹这一情节是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血腥一刻，它与幸存者口述中那些从面包车持刀涌出的身影、那些猝然劈落的军刀，以及青年刹那间消失的半边头颅，形成残酷的镜像叠合⁴²，让读者意识到虚构与记忆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更让暴力的痕迹在不同叙述中相互回响，像阴影般纠缠不去。

综上，《蜕》借由对肉体创伤的细致书写，将个体的血肉之痛与集体的历史记忆紧密勾连。无论是小说中的虚构叙事，还是幸存者的口述回忆，两种叙述一属文学，一属历史，却在不同时空的书写中浮现出相同的暴力基因，仿佛同一道伤口在不同载体上渗出的血痕，最终汇聚成无法否认的历史证言。

³⁸ “World: RACE WAR IN MALAYSIA”, Time, May 23, 1969, 检索于 2025 年 7 月 20 日, <https://time.com/archive/6636943/world-race-war-in-malaysia/>。

³⁹ 贺淑芳，《蜕》，页 177。

⁴⁰ 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页 86。

⁴¹ 贺淑芳，《蜕》，页 178。

⁴² 林嫒婷，《五一三事件华人之集体记忆探讨》，页 49。

第二节 心理创伤：挥之不去的阴影

心理创伤并非线性的发展过程，而是会反复浮现，甚至延迟显现，在心理深处留下不断变化的印记。在心理学层面，“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 PTSD）常被用来解释此类现象，当个体在经历、目击或遭遇灾难、死亡及其威胁后，虽症状可能在事发当下未立即显现，却会在日后持续并长时间困扰其精神与情绪状态。⁴³在《蜕》中，凡是亲历“五一三”事件的主人公——无论是叶金英、叶阿清还是陈桂英，几乎都带有 PTSD 的特征，尤其体现在创伤记忆的侵扰性上。即便当事人刻意回避与之相关的人事与情境，记忆依然会通过闪回、梦境的形式强制重现。⁴⁴《蜕》的创伤书写不仅呈现了心理创伤的复杂面貌，更揭示记忆如何在反复与迟滞中被记录。

（一）梦境

“五一三”事件爆发后的第三个夜晚，桂英梦见全家人仓皇逃命，沿途散落着断臂与断头。逃亡途中，一堵高墙挡住了去路，她拼命攀爬，直至指尖流血、痛彻心扉。低头望去，一个熟识之人剖腹跌肠、血淋淋地倒卧地面，她在梦中痛哭不止。⁴⁵这个梦境清晰地映照出桂英连日来的恐怖经历，无论是街道上此起彼伏的枪声、惊慌逃散的人群，还是空气中弥漫的硝烟味。更令她痛心的是，弟弟陈国豪在事发当天骑脚踏车去外婆家后便杳无音讯。⁴⁶此外，小说中特

⁴³ 陆扬，〈创伤与文学〉，页 16。

⁴⁴ 冯少敏，《创伤理论视角下的“创伤写作”研究》，页 17。

⁴⁵ 贺淑芳，《蜕》，页 23。

⁴⁶ 贺淑芳，《蜕》，页 22。

别描写道，桂英亲眼目睹同住一层的装修阿哥的尸体就横卧在楼下五角基大门口。⁴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指出，当惊吓的冲击越过大脑的防线，创伤便由此生成。⁴⁸桂英所遭遇的这些接连而至的强烈冲击，已足以构成深刻的创伤记忆。弗洛伊德亦指出，梦境素材往往来源于最近的体验，尤其与做梦前一天的经历密切相关。⁴⁹因此，邻居的惨状在她的梦中被延续并放大，化作更加扭曲可怖的画面；而梦中那堵无法跨越的高墙，则是象征她在现实中寻找弟弟时的无能为力，无论她如何攀爬，依旧无法跨越命运的阻隔。这场梦境，正是她潜意识对现实恐惧与无助的最真切投射。

这种创伤性梦境在桂英母亲叶金英身上同样得到印证，自从其母翁亚玉的房子被烧毁四十九天后，叶金英的梦境就被火焰、暴力与死亡占据。在华人丧葬习俗中，逝者往生后每隔七天由家人举行一次祭奠，共七次，总计四十九天，通常被视为亡魂超度完成的标志。⁵⁰然而，对叶金英而言，这却成为创伤记忆强势回归的开端。她的梦境始于一缕从门缝钻入的火光，迅速蔓延，吞噬柜中衣物，并灼伤女儿的面庞与发丝。书页化作灰烬，兄长与他的帆布椅一同陷入火海，连饭桌也在烈焰中消失。国豪面色憔悴、身形消瘦，在火光中低声安慰母亲自己会再度归来。随即，场景骤然交替于旧居与暴力横行的灾难现场之间——燃烧的窗帘、屋外刀光与呼喊交织，餐桌上血胎膜在炉火上翻滚，亲人们虽喉咙被割破，仍嘶哑着催她回去。⁵¹梦境这种反复切换与重现，并非源自愿望的满足，而是创伤记忆的强迫性回返，令个体在非自愿状态下一次又一次重

⁴⁷ 贺淑芳，《蛻》，页 23。

⁴⁸ 贺江，〈创伤理论与创伤文学〉，页 133。

⁴⁹ 车文博，《弗洛伊德文集〈释梦〉》，页 121。

⁵⁰ 〈七七安宁〉，富贵 Nirvana，检索于 2025 年 8 月 15 日，<https://www.nirvana.com.my/zh/%E4%B8%83%E4%B8%83%E5%AE%89%E5%AE%81/>。

⁵¹ 贺淑芳，《蛻》，页 30。

历灾难瞬间。⁵²凯茜·卡鲁斯（Cathy Caruth, 1955-）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这类梦境是一种未被认领的经验，会在潜意识中以延迟、间接的方式持续存在，即便当事人有意回避，创伤依旧会在无意识层面固着并回返。⁵³叶金英梦中火焰的反复入侵、旧家与灾难场景的无序切换，正是这种延迟性回返与精神固着的直观呈现，火不仅是母亲房屋被焚毁的直接记忆，也是创伤持续侵蚀其精神世界的象征。此后，叶金英变得极度敏感，甚至对家人夜间上厕所这类正常活动都感到焦虑，并会反复检查门锁。⁵⁴这种行为正印证朱迪思·赫尔曼（Judith Herman, 1942-）所指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之一是“过度警觉”（hypervigilance），即个体会常规且不间断地预想自己可能处于危险之中。⁵⁵梦中那道从门缝钻入的火光，延伸成现实中对门的恐惧与不安。叶金英一次次检查门锁，仿佛以这种徒劳的动作抵御心底无法掌控的阴影。这表明，创伤已从一种心理状态，具体化为一种可见的日常行为，牢牢支配着受害者的生活。

小说中桂英与叶金英的创伤性梦境，在“五一三”事件亲历者身上，同样获得印证。魏月萍的研究记载，她在访问一位1967年赴马来西亚工作的幸存者时发现，即便在事件过去半个世纪后，创伤记忆依然如影随形。该幸存者受访时已年逾古稀，视力尽失，行动需人搀扶。然而，在访谈前数日，受访者频频被噩梦惊醒，在他的梦境中，熊熊烈火吞噬着他曾寄托理想与希望的马来西

⁵² 赵韶晖，《文学性创伤叙事研究》（金华：浙江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页49。

⁵³ 赵韶晖，《文学性创伤叙事研究》，引自Cathy 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and the possibility of History》，页14。

⁵⁴ 贺淑芳，《蛻》，页31。

⁵⁵ 冯少敏，《创伤理论视角下的“创伤写作”研究》，页15。

亚。⁵⁶由此可见，无论置于小说还是现实，梦境都不仅是心理层面上后滞性回返的典型症状，也是一种能够被文学捕捉与再现的记忆形态。贺淑芳通过虚构人物的梦境描写，将幸存者潜意识中挥之不去的恐惧与无力转化为叙事，使个体的心理创痛得以被言说、被见证。这种创伤书写既揭示创伤在个体心灵上的固着与延宕，也凸显小说作为历史记忆承载体的独特功能。

（二）沉默

如果说梦境是创伤在夜晚悄然浮现的方式，那么沉默则是创伤在白昼中的另一种存在形态。沉默往往成为创伤家族中的共通语言，是一种拒绝回应的姿态，仿佛受害者刻意与自身的过往保持距离。⁵⁷然而，沉默并不只是语言的缺席，它也可能意味着受害者在心底封存着难以言说的记忆与经验。正因如此，沉默具有一种悖论性：它一方面阻断了个体与外界的沟通，使其创伤的背后难以被理解；另一方面，也使个体难以真正触及那段过往。⁵⁸然而，就桂英而言，这种“难以触及”更多体现为主动的回避，她选择不谈、不提，从而让痛苦被掩盖，却始终潜伏在心底。当桂英与许久不见的美姬相聚时，她能够轻松谈论做菜、娱乐，能聊死人生意，不谈亲人的死亡；能说结婚生意，却回避自己破碎的家庭。⁵⁹这样的沉默并非遗忘，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保护。因为桂英明白，一旦言说，就可能被视为“受难者”。当然，这种沉默并非桂英一人的选择，而是“五一三”之后社会的普遍写照。在小说中，桂英害怕他人注意她们

⁵⁶ 魏月萍，〈“五一三”的记忆之工〉，页 202。

⁵⁷ 陈静，〈代际创伤中的沉默〉，页 109。

⁵⁸ En-hui Shih，〈The Voice of Trauma: The Silence of the Traumatic Self in Pat Barker's Another World〉，《兴大人文学报》2022 年第 69 期，页 199。

⁵⁹ 贺淑芳，〈蛻〉，页 165。

的创伤，也害怕老师提起，更怨恨老师在班上保持沉默⁶⁰；而现实中，师生看到佩戴孝服的孩子，也选择保持沉默，仿佛一切从未发生。⁶¹这种压抑的记忆甚至渗入日常，有些人每逢选举便习惯性地囤粮，以防再次陷入饥饿与恐惧，即便数十年过去，他们仍然担心言说会招致后果。⁶²在《蜕》中，这种沉默也在家庭内部延续并影响下一代。

就如“五一三”事件的两个个月后，金英及其丈夫陈亚位的生活发生剧烈变化，丈夫失业，精神状态异常，夫妻关系也随之裂解。金英和亚位从未向女儿桂英解释原因，导致她一直都无法理解家庭突如其来的变化，虽察觉父母关系破裂，仍选择效仿父母的沉默，甚至学会刻意回避那些令自己痛苦的事件。⁶³这种沉默与回避的模式直到桂英的女儿萝长大了也没有改变。桂英及其母亲金英依旧通过回避谈及“五一三”事件和亲人死亡，甚至抗拒接触死亡新闻或影视情节。⁶⁴即使她们保持沉默或极少沟通，其影响仍会渗透至下一代，使子女心理更加敏感。⁶⁵

萝虽然没有亲历那段历史，却敏锐地察觉到外婆、妈妈与阿姨们从未真正遗忘，只是将创伤深藏心底，她明白她们“永远受尽委屈又说不出真相”。⁶⁶导致萝一直“生活在阴影之下”（living under the shadow）⁶⁷，那些未言说的创伤化为一种阴影，压抑、控制并困扰着她，从而影响她的性格与情感。例如她在与男性的关系里，总带着一种莫名的不安与自责，甚至凭直觉觉得自己将会伤

⁶⁰ 贺淑芳，《蜕》，页 99。

⁶¹ 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页 180-182。

⁶² 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页 199-200。

⁶³ 贺淑芳，《蜕》，页 90-94。

⁶⁴ 贺淑芳，《蜕》，页 222。

⁶⁵ 陈静，〈代际创伤中的沉默〉，页 109。

⁶⁶ 贺淑芳，《蜕》，页 218。

⁶⁷ 陈静，〈代际创伤中的沉默〉，页 110。

害那个人，于是干脆怠慢对方来信，把关系推向冷淡。⁶⁸她的逃避，其实正重演母辈用沉默保护自己的模式。当关系最终破裂时，萝选择不断搬家，不愿长时间待在家里。她无法忍受家人永远笑意盈盈、热衷聚餐的场面，因为她心里清楚，那笑容底下隐藏着长久的苦涩与压抑。表面的热闹，反而让她更强烈地感到孤立，于是她宁可躲进空荡的宿舍房间，却在那沉默里愈发感到囚禁。她下班回到宿舍，只剩练习簿要批改，日复一日的静默让她透不过气。一次，她甚至在教室里失声大哭，让同事们束手无措。⁶⁹可见母辈未能言说的痛苦以“阴影”的形式渗透进萝的生命，使她在无意识中不断复制与承受这份伤痕。

在现实中，许多“五一三”事件的亲历者因恐惧、禁忌，或是希望子女不再背负历史负担而选择沉默。例如幸存者 B 先生坦言自己极少提及当日记忆，只因希望那一天从未发生。⁷⁰记者在采访中也曾遇到受访者直言“五一三”是禁忌话题⁷¹；甘榜巴鲁（Kampung Baru）其中一个支部的创办人兼主席表示自己从未向后代详述此事，主张年轻人无须知晓太多，以免承受沉重的历史包袱。⁷²正因如此，现实中这种沉默往往导致新一代逐渐遗忘，乃至与这段历史完全断裂。然而，在贺淑芳的《蜕》中，沉默并未使创伤消散，反而以“阴影”的方式渗透进下一代的生命。即便母辈从未开口，压抑的痛苦依旧在家庭氛围与人际关系中延续，并塑造女儿萝的敏感与孤立。与现实相对，作者这样的叙事揭示沉默的另一面，它不仅可能制造遗忘，更可能成为创伤跨代传递的隐秘渠

⁶⁸ 贺淑芳，《蜕》，页 217。

⁶⁹ 贺淑芳，《蜕》，页 218。

⁷⁰ 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页 70。

⁷¹ 林凯颂，〈逐渐被遗忘历史记忆——五一三事件〉，《Malaysiakini》，2025 年 5 月 13 日，检索于 2025 年 7 月 21 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letters/743108>。

⁷² 郭史光庆，〈513 事件阴影渐散不再受落〈br〉目击者皆不齿政客旧事重提〉，《Malaysiakini》，2010 年 5 月 13 日，检索于 2025 年 7 月 21 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131670>。

道。由此可见，现实中的沉默带来社会记忆的断裂，而文学中的沉默则展现心理创伤的延续。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中，《蜕》通过文学记忆弥补历史的空白，正如作者所言：“文学能够去到我们日常去不到的地方”⁷³，这句话不仅揭示文学的独特力量，也透露《蜕》所呈现的创伤记忆书写并非单纯的个人叙事，而是一次对历史与记忆缺席的回应。

⁷³ 罗昕，〈对话 | 澎湃新闻专访贺淑芳：《蜕》书写了三代女性的生活与境遇〉，检索于 2025 年 8 月 25 日。<https://web.shobserver.com/sgh/detail?id=1466450>。

第三章 动物意象书写

在《蜕》中，动物意象被赋予深厚的象征意义，成为创伤与记忆的重要载体。其中，蛇与蜘蛛两种除了蜕皮的特性与小说名字暗合，其带来的意象还分别折射出创伤的侵袭与纠缠，以及个体蜕变与重生的可能性。蛇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威胁、恐惧与不可控的力量，它以突兀的方式闯入日常，象征创伤记忆如何不受控制地反复侵扰心灵；而蜘蛛则在阴影与蜕皮之间往复游走，既代表创伤的缠绕，也象征个体在痛苦中挣扎蜕变的过程。通过这两种动物意象的双重呈现，作者不仅展示“五一三”创伤在个体生命中的延宕与反复，也揭示在不断的挣扎与记忆书写中，人依然可能获得重新面对创伤的力量。

第一节 蛇：创伤与记忆

在传统文化中，蛇意象始终承载着矛盾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因其隐匿行踪、致命攻击的特性，蛇自古被视为邪恶与死亡的象征；另一方面，在某些文化语境中，蛇又因蜕皮重生的特性而被赋予智慧与再生的寓意。⁷⁴这种双重性使蛇成为文学中极具表现力的符号，既用来象征外在的威胁，也可用来映射内在的心理状态。作者在《蜕》中巧妙地继承了这一传统文化意象，通过具体的小说情节将蛇与人物的心理创伤紧密结合，在〈冲凉房里的蛇〉中便出现了这样一段描写：

⁷⁴ 李艳，李红岩，〈《搜神记中》蛇意象书写研究〉，页 39。

“浴室里来了一条蛇。她冲出浴室直奔上楼。水池边，靠近水喉头处，那青蛇闪着碧绿幽光，盘踞，竖起，昂头吐嘶。

楼下租客阿烈从灶口旁边抽出一把火炭钳，进浴室，伸到丝丝吐嘶的蛇头前，那蛇给激怒，爬上，还待蜿蜒曲进，猛然就给火钳夹住。

他抬着那把火钳，“闪开！闪开！”一路飞冲出门口。”⁷⁵

笔者将此文本中的蛇视为象征“创伤”的邪恶本体。文本将场景设置在浴室之中，而浴室作为个体清洁与裸露的场所，本应是最私密、安全的空间，却因蛇的闯入而骤然失守。隐喻个体最为脆弱的心理状态，象征心灵深处毫无防御的区域。此时，一条闪着碧绿幽光的青蛇盘踞在水池边，其突然的出现，恰如“五一三”事件的突发而造成的创伤，让其在个体最无力之时乘虚而入，直击内心深处。蛇的动态描写，又盘踞到竖起、再昂头吐嘶，展现逐层递进的威胁感，隐喻从潜伏、积聚，到浮现、爆发，直至对个体心理的全面冲击。创伤记忆犹如蛇般盘绕心灵，随时可能以压倒性的方式侵袭个体，带来难以承受的心理痛苦。

面对突然而至的青蛇，阿清与阿烈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目睹蛇影的瞬间，阿清立即逃离浴室直奔上楼；阿烈则选择拿起厨房的火炭钳，主动进入浴室与蛇正面对峙，最终成功将蛇夹住并丢弃门外。这一对比可视为两种创伤应对策略的隐喻。阿清的逃避象征著个体面对创伤时的退缩与回避，正如金英、桂英选择以沉默面对历史创伤，她们通过隔绝与创伤的直接接触来维持暂时的安全感，然而却也意味着创伤始终盘踞于心理空间，未曾真正得到解决。

⁷⁵ 贺淑芳，《蛻》，页 98。

与之相对，阿烈的行动则代表了直面创伤的尝试。他以火炭钳作为应对工具，意在主动掌控并清除青蛇。但在过程中，青蛇因受到挑衅而被激怒。作者借此揭示，直面创伤并不是线性的解决过程，而是一种伴随反复、阻力甚至暂时恶化的挣扎。这种情境说明，对创伤的处理并不会一帆风顺，而是需要在反复对抗与不断调整中，逐步将其从核心移至边缘，使之不再支配个体的精神生活。金英的经历正是这种挣扎的例证，她时而前往双溪毛糯麻风病院（Sungai Buloh Leprosy Settlement）后山祭奠“五一三”事件的亡灵，时而因恐惧而却步；甚至有一次归来甚至痉挛发作，声称“有几百个鬼魂在那里，全部都惨死。”⁷⁶这种忽进忽退的状态，印证创伤在个体生命中的缠绕与拉扯。直至多年后，金英因病入院，等到终于能够开口说话时，她把关于“五一三”事件的记忆全部都讲出来，坚持要在尚能记忆之时，为亡者正名、拒绝污名。⁷⁷这一瞬间的释放，来得并不顺遂，而是压抑、反复、恶化之后的解脱。

回到蛇意象的文本中，最终蛇丢出去的结果，可以理解为某种意义的蜕变成功。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成功不是指创伤的完全消失，而是指个体获得了与创伤共处的能力。创伤记忆就像被丢到门口的蛇，它仍然存在，但已经不再具有原先的威胁性。个体正是在这一象征性整合过程中，完成了对创伤的重新定位，从而在心理层面实现了蜕变与再生。

在〈杜丽娘〉这节，蛇的意象再次出现，对比青蛇，它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生物，而是由个体的潜意识召唤出来的黑蛇，专门修复那个无法用言语述说的疼痛：

⁷⁶ 贺淑芳，《蜕》，页 223-224。

⁷⁷ 贺淑芳，《蜕》，页 240。

“睡梦的修复方法，就是从他脑海深处，释放出一条长满黑鳞滑腻的蛇，那条蛇沿着胸口的洞溜出来，凉凉地，游过疼痛的地方，吸收了那无法讲出来的，吐嘶。

到天亮以后，那蛇就消失了。……但到天黑以后，或者在天色阴暗的日子里，疼痛又会回返。到他喝醉了，睡着了，梦又把蛇叫出来，凉凉的，冷冷的，吐嘶。”⁷⁸

从形象上看，蛇全身覆盖着黑色的鳞片。黑色不仅与夜色相连，更常被中西方文化视作死亡、恐怖与罪恶的象征。⁷⁹因此，黑蛇在这里远非单纯的自然生物，而是潜意识召唤出的象征体，承载着无法言说的恐惧与死亡经验。更为关键的是，黑色在文化意义上还关联着遮蔽与不可见⁸⁰，这使得黑蛇的“黑”意象得以与马来西亚“五一三”事件发生联结。作者在《蜕》中曾写，国家档案馆虽规模宏大，却唯独缺少1969年5月的记录；全世界每一个图书馆和每一份简报都找不到那一年的资料，唯独在马来西亚境内一片空白，⁸¹是官方刻意制造的缺席。1969年5月15日，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全面禁止报章发行，直至新的新闻审查条例确立为止。⁸²政府为了防止谣言引发恐慌，严格限制言论，排除了任何非官方的声音，使事件的多元记忆被压制为单一的叙事，即“五一三”事件只是一场突发性的种族冲突。更重要的是，除同年10月发表官方白皮书《五一三悲剧》外，无论社会舆论如何，政府再未提供任何新的报告释疑。⁸³正

⁷⁸ 贺淑芳，《蜕》，页198。

⁷⁹ 张玉春，〈汉英颜色词“黑色”和“BLACK”象征意义分析〉，页79。

⁸⁰ 张玉春，〈汉英颜色词“黑色”和“BLACK”象征意义分析〉，页79。

⁸¹ 贺淑芳，《蜕》，页261。

⁸² 柯嘉逊，《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513解密文件》，页513。

⁸³ 林嫒婷，〈五一三事件华人之集体记忆探讨〉，页35。

如马来西亚政治学者阿兹米尔（Aznil Tayeb）所言，马来西亚至今从未真正面对或接受这段 56 年前的历史。⁸⁴这种被人为制造的历史空白，恰与黑蛇的黑色属性彼此映照。在心理层面，黑蛇象征潜意识中无法言说的阴影；在社会层面，“黑”则隐喻历史档案的空缺与集体记忆的遮蔽。

在梦境中，黑蛇被召唤出来，顺着胸口的伤洞缓缓爬行，吸附了未难以言说的痛苦。从未的感受来看，黑蛇仿佛在治愈他，为他带来片刻安宁。在他的意识中，这是一种自我慰藉，是潜意识尝试修复自身的方式。然而，这种修复并不意味着创伤的真正消散。黑蛇之所以能够不断被召唤，即证明创伤仍在体内沉积。从文本可以发现，黑蛇的出现，是由酒精、黑夜与梦境三者触发。其中，酒精的作用尤为关键。从医学角度来看，酒精具有麻痹神经中枢的作用，过量饮用容易使人产生幻觉、意识模糊。⁸⁵在这种状态下，个体的抑制能力下降，使潜意识中被压抑的痛苦更易浮现，因此未的梦境成为痛苦的具象化场域，从而幻想出一条黑蛇去治愈这些痛苦，也侧面反映未企图在梦境中自我修复。然而，黑蛇表面带来片刻安慰，却无法真正消解创伤。黑蛇也因此成为一则隐喻，也是作者想提醒读者的，“五一三”事件造成的心理创伤不会真正消失，而是以隐蔽和循环的方式持续存在于内心。

⁸⁴ 〈真相尘封半世纪 513 走不出的阴影〉，《星洲网》，2025 年 6 月 1 日，检索于 2025 年 9 月 2 日。<https://member.sinchew.com.my/contents/6578885?articleType=everyone>。

⁸⁵ 张鑫，王佳乐，薛钦予，岳超颖，李鑫鑫，〈酒精依赖症状研究〉，《黑龙江科学》2020 年第 6 期，页 43。

第二节 蜘蛛：纠缠与蜕变

在文学传统中，蜘蛛承载着颇为矛盾的文化内涵。一方面，正如苏拯《蜘蛛》、郑清之《檐前蜘蛛》等古典诗歌所示，蜘蛛因捕食习性而常被赋予精于算计、布设陷阱、暗藏杀机的负面象征，成为欺骗与恐惧的化身⁸⁶；另一方面，在民俗的语境中，蜘蛛又因“喜子”之谐音被视为吉祥、好运与巧智的预兆。⁸⁷然而，在《蜕》中，蜘蛛不再仅指向外界的吉凶祸福，而是潜伏在记忆的阴影中，既象征创伤的缠绕，也预示心灵的修复。蜘蛛的每一次牵引，不仅牵动眼脸，更牵动记忆深处未被言说的情感与历史。这种意象的运用，使得蜘蛛超越传统的象征框架，成为一种具有心理深度的隐喻，暗示着创伤的重复与自我意识的苏醒。最终，蜘蛛不仅是恐惧的源头，也成为了理解自我、重构叙述的媒介，体现出现代文学对复杂心理现实的深刻探索。

蜘蛛的出现，最早来自阿清外甥女的梦境：

“蜘蛛在衣柜与墙壁之间的阴影里织网。我和你一起往阴影里看。

它每勾一下，我们的眼睛就跟着眨一下；好像我们的眼睛也是蜘蛛织的。”⁸⁸

从文本可见，蜘蛛出现的位置，不在光明处，而是潜伏在衣柜与墙壁之间的阴影里。这个幽暗、被遮掩的角落，恰如潜藏在记忆深处的创伤，不会在日常生

⁸⁶ 武小钰，吕汝泉，〈中国古典诗歌与日本俳句中“蜘蛛”意象的差异〉，页 10。

⁸⁷ 武小钰，吕汝泉，〈中国古典诗歌与日本俳句中“蜘蛛”意象的差异〉，页 11。

⁸⁸ 贺淑芳，《蜕》，页 72。

活中显现，而是蛰伏于无意识的暗影之下。正如创伤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创伤，都会在心灵深处留下难以言说的记忆碎片。蜘蛛在暗处勾动丝线，而人物的眼睛在明处随之反射性眨动，这说明创伤与个体之间是无法分割的。即便在表面平静的环境中，内心仍会因外部刺激或阴影的触发而不自觉地颤动。阿清的经历正是明证，她在暴动中失去了最要好的朋友友梅，当第一次得知婆婆也名叫“张友梅”时，这两个字仿佛钥匙般骤然开启了她长期封存的记忆。表面上，她依旧能维持正常的生活：照顾孩子、做饭、打扫，井井有条；然而独处时，那些被压抑的情绪便悄然浮现。她在沐浴时于花洒下抽搐着哭泣，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那个失去亲人挚友的少女。这样的情绪崩溃，说明她内心深处的伤口从未真正愈合。从这里的蜘蛛意象可见，创伤是如蛛丝般脆弱却牢固地缠绕着个体感知，被轻轻触动，便可能激起深层的痛楚与记忆。

此外，蜘蛛意象在《蜕皮》中得到进一步呈现，但与前文所表达的意象截然不同：

“却原来是蜘蛛在吐沫。再看，不是吐沫，屏息地看着，是蜕皮……蜘蛛脱皮很久，很缓慢，就像蝉蜕皮，蛇蜕皮。退出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壳，一条细丝，蜘蛛和它的旧空壳，空壳还在轻轻旋转，孪生镜子，一生一死。”⁸⁹

⁸⁹ 贺淑芳，《蜕》，页 219-220。

蜕皮是节肢动物成长的必经过程，它必须脱掉旧的外骨骼才能继续生长，同时也可能摆脱附着的寄生虫。⁹⁰文本中蜘蛛缓慢脱去旧壳的描写，象征个体挣脱“五一三”事件束缚、获得新生的过程。然而，这种蜕变并非瞬间完成，而是像蜘蛛脱皮一样，需要时间、耐心与勇气。当蜘蛛最终脱离旧壳，留下的空壳与新生个体形成镜子，恰如创伤中的个体重新认识自己，旧我仍然存在，但成为可观察的过去，新我则获得自由。尽管作者在《蜕》中并未大量描写角色成功蜕变的过程，正如萝说的：“生物蜕皮是很危险的……有很多昆虫，在这过程死去，蜕皮原来会致命。”⁹¹并且，当一个人所承受的痛苦超出某种极限时，摆在他面前的往往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走向毁灭，在绝望中结束生命；二是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努力走出创伤。⁹²这意味着，蜕变并非必然成功，而是一种充满风险的尝试。然而，作者仍通过宋红欢的形象，展现了成功的可能性。蜘蛛意象所象征的心理蜕变，最终在她的故事中得以完整呈现。

宋红欢这一角色自幼便深陷于创伤的漩涡之中。她对自己的姓氏充满厌恶，因为养父从未给予她应有的关爱，甚至在登记户口时都懒得为她取名，为她取名“妹仔”。养父后来另组家庭，将她与养母弃之不顾，唯有养母艰难地抚养她成人，她极度希望自己能跟养母姓红，这也是后来她为自己改名成宋红欢的原因。⁹³成长过程中，她还曾遭遇性侵的恐怖经历，以致于多年以后，睡意袭来时仍会突然惊醒，仿佛那一刻的阴影从未散去。⁹⁴随后，她又经历了“五一三”事件的动荡，好不容易遇到心仪之人宋万波，对方却蒙冤入狱，使她再度

⁹⁰ <为什么昆虫，毛蜘蛛，以及其他生物要蜕皮？>，国家地理杂志，2022年5月11日，检索于2025年8月29日。<https://www.natgeomedia.com/science/article/content-15176.html>。

⁹¹ 贺淑芳，《蜕》，页220。

⁹² 冯少敏，《创伤理论视角下的“创伤写作”研究》，页17。

⁹³ 贺淑芳，《蜕》，页48-49。

⁹⁴ 贺淑芳，《蜕》，页61。

陷入孤独。几年后，宋万波获释，两人重逢，当她再度回望这段坎坷的人生时，蓦然领悟到：“霎那间，有个新的你出生，也有一个旧的你死去。”⁹⁵最终，她像蜘蛛脱下旧壳一样，把象征压迫的“宋”姓和所有曾经的恐惧放在一边，不再被它们束缚。过去的自己仍然存在，但已经像一面镜子，可以平静地回望；新的自己则像破壳而出的蜘蛛，自由地面对生活。

纵观来看，蜘蛛最初在阴影中织网，每一丝丝线都牵动着观察者的眼睛，正如创伤紧密缠绕个体感知。而当蜘蛛缓慢脱去旧壳，留下空壳与新生个体，那缠绕的丝线也随之松开。蜘蛛织网与蜕皮形成一条连续的意象脉络，从潜伏于阴影的束缚，到努力挣脱，再到获得心理自由与新生。它不仅象征创伤的缠绕与隐秘存在，也体现个体在时间流逝和自我觉察中的渐进性修复。通过蜘蛛意象，文本呈现创伤与记忆的交织，使角色的心理变化、痛苦经历与重建过程更加立体。同时，它也揭示希望与可能性，尽管蜕变充满风险与痛苦，但个体仍可通过勇气与耐心走向新生，旧我成为可回望的镜像，新我则以自由姿态面对生活。

⁹⁵ 贺淑芳，《蜕》，页 62。

第四章 结语

本研究聚焦于马来西亚小说家贺淑芳的长篇小说《蜕》，探讨其如何通过记忆书写重构“五一三”这一历史创伤事件，并以肉体、心理与动物意象的多重维度展现创伤经验的复杂性。在肉体层面，血肉的残酷书写不仅揭示个体在暴力压迫下的生存困境，也将个人痛苦提升为社会性印记，映照族群之间难以磨灭的张力。在心理层面，细腻的心理描写强化创伤的反复性与潜伏性，凸显出个体与集体共享的心理阴影，从而引发对人性、社会记忆以及历史暴力机制的深刻思考。与此同时，动物意象使创伤的表现获得更深层次的张力。蛇与蜘蛛既代表恐惧与束缚，也象征着蜕变。这种双重性使它们的意象不断延伸出新的含义，从而赋予创伤更多层次的文学表达。更为重要的是，《蜕》的创伤记忆书写凸显文学在历史记忆传递中的独特功能。它既是对“五一三”历史事件的再现，也是对集体记忆的召唤，使读者得以在文学的空间中直面被遮蔽的历史与难以言说的痛苦。由此可见，《蜕》不仅是个人经验的抒写，更是历史、社会与文化交织的复合文本，其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在于：通过创伤的再现，推动重新审视族群关系、历史伤痕与人性的复杂性。

因此，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揭示《蜕》如何通过多重的创伤记忆书写与动物意象，实现历史的再思考与人性的再探讨。通过这样的分析，不仅理解《蜕》在文学上的创新价值，也进一步确认文学作为社会记忆与历史见证的重要角色。在此基础上，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首先，可进一步比较《蜕》与其他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的创伤叙事，探讨不同族群、不同历史语境

下创伤书写的异同与互补。其次，可结合当代创伤理论、记忆研究及心理学成果，对《蜕》中反复性记忆与创伤再现的机制作更细致的阐释。通过这些延伸研究，有望进一步拓宽《蜕》在文学、历史与文化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与解释空间。

第五章 引用书目

专书

1.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513解密文件》，八打灵：人民之声出版，2007。
2. 贺淑芳，《蜕》，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23。
3. 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八打灵：文运企业，2020。
4.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车文博，《弗洛伊德文集（释梦）》，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
6. 王德威，《一九四九：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

期刊论文

1. 赵雪梅，〈文学创伤理论评述——历史、现状与反思〉，《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一期，页201-211。
2. 贺江，〈创伤理论与创伤文学〉，《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页132-136。
3. 程勇真，〈“虱子”意象的历史生成及内在审美意蕴分析〉，《美学史研究》，2017年第9期，页14-16。

4. 陈静,〈代际创伤中的沉默〉,《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0期,页109-111。
5. 李艳,李红岩,〈《搜神记中》蛇意象书写研究〉,《长江小说鉴赏》,2025年第1期,页38-41。
6. 张玉春,〈汉英颜色词“黑色”和“BLACK”象征意义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49期,页79。
7. 张鑫,王佳乐,薛钦予,岳超颖,李鑫鑫,〈酒精依赖症状研究〉,《黑龙江科学》2020年第6期,页42-43。
8. 武小钰、吕汝泉,〈中国古典诗歌与日本俳句中“蜘蛛”意象的差异〉,《文学教育》,2019年第4期,页10-12。
9. En-hui Shih,〈The Voice of Trauma: The Silence of the Traumatic Self in Pat Barker's Another World〉,《兴大人文学报》2022年第69期,页199-224。

新闻

1. 罗昕,〈对话|澎湃新闻专访贺淑芳:《蜕》书写了三代女性的生活与境遇〉,《澎湃新闻》,2024年11月23日,检索于2024年11月25日。<http://web.shobserver.com/sgh/detail?id=1466450>。
2. 林凯颂,〈逐渐被遗忘历史记忆——五一三事件〉,《Malaysiakini》,2025年5月13日,检索于2025年7月21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letters/743108>。

3. 郭史光庆, <513 事件阴影渐散不再受落
目击者皆不齿政客旧事重提>, 《Malaysiakini》, 2010 年 5 月 13 日, 检索于 2025 年 7 月 21 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131670>。
4. “World: RACE WAR IN MALAYSIA” Time, May 23, 1969, 检索于 2025 年 7 月 20 日。 <https://time.com/archive/6636943/world-race-war-in-malaysia/>。
5. <真相尘封半世纪 513 走不出的阴影>, 《星洲网》, 2025 年 6 月 1 日, 检索于 2025 年 9 月 2 日。 <https://member.sinchew.com.my/contents/6578885?articleType=everyone>。

学位论文

1. 林媛婷, 《五一三事件对华人之集体记忆探讨》, 南投: 国立台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硕士论文, 2007。
2. 冯少敏, 《创伤理论视角下的“创伤写作”研究》, 哈尔滨: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1。
3. 赵韶晖, 《文学性创伤叙事研究》, 金华: 浙江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0。

网络资料

1. 国家地理杂志, <为什么昆虫、毛蜘蛛, 以及其他生物要蜕皮? >, 2022 年 5 月 11 日, 检索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 <https://www.natgeomedia.com/science/article/content-15176.html>。

2. 思想空间, <傅向红: 幽魂飘往何处? 马来西亚五一三的民间述说 (二之二)>, 2021年9月22日, 检索于2025年9月2日。 <https://www.linking.vision/archives/5219>。
3. 富贵 Nirvana, <七七安宁>, 检索于2025年8月15日, <https://www.nirvana.com.my/zh/%E4%B8%83%E4%B8%83%E5%AE%89%E5%AE%81/>。

